

■图片故事

我1930年出生。全家五口人，奶奶，爸，妈，妹妹和我。全靠我父亲一人在什刹海周边胡同里叫卖油盐酱醋为生。

我在前井胡同刘记私塾馆里念书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，卢沟桥事变害的老百姓不能安身。穷人没有活路，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，奶奶、父亲积劳成疾，无钱医治，先后去世了。一家人的顶梁柱没了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，剩下妈、我和妹妹。娘仨这日子怎么过呀。

乍开始我妈有时带着我早晨天没亮就去德胜门早市的野摊卖货，有时把我们托付给邻居家照看，妈去给有钱人家打短工。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哪有穷人的站脚之地。1942年，为了生活我被送往灯市口孔雀理发馆学徒。妹妹李元英被送往西什库，外国人开办的所谓的“慈善堂”当童工。

有一次我妈带着我去看望妹妹，进门先登记，然后在一间屋里等。不多时一位管工模样的阿姨带着我妹妹从楼上来到屋里。妹妹见着我妈似哭非笑，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妈！妈当时含泪把妹妹搂在怀里，不停地问寒问暖。我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很快时间到了，管工催促着我们分手告别。回家的路上，妈和我没说一句话。又一年多，有一天，妈失魂落魄地告诉我说：“你妹妹死了。”我问：“您看见了？”妈说：“我去看望时，人家说她得的肺炎，发高烧死了。”这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一句话，差点击晕了妈妈。

没想到，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，就这样没了。当时的北京是沦陷区，日本搞第五次强化治



不堪回首的记忆

□李元海



安，粮店里没有粮食，买混合面都按配给。为了我，我妈咬着牙也要活下去。

1947年的冬天，妈妈终因病魔缠身，贫困交加，一病不起，最终死在我姨家，死时才47岁。

有时想起来，我非常感恩我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的妈妈，是她给我找了个好工作。“学会手

艺能剃头，挣钱吃饭不发愁”。人生短短数十载，我们一家却经历了许多不堪回首的生离死别，就像墙上无法抹去的蚊子血一样醒目，每每想起，心里头总紧紧得疼上一阵。

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我却与家人阴阳两隔。总想狠着劲儿地好好活，为自己，更为了他们。

■家庭相册

想念奶奶

□何昊 文/图

45年前的冬至，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在我思亲的记忆中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奶奶了。时间久远，记忆已是愈发的模糊，但奶奶的笑容笑貌，那布满皱纹的脸庞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奶奶对我的疼爱一言难尽。1942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满3年，生母不幸病故，小小的年纪便失去了母爱。是奶奶一把将我搂在怀中，把呵护和疼爱重新带给了我，让我又有了亲情和微笑。旧社会的贫穷、动乱让奶奶无缘读书识字，她尝够了没有文化的痛楚，从而对我的成长寄予殷切的希望。我上小学时，有一年过春节，她让我带着她亲手蒸的豆包儿，送给小学校里留守的外地老师。我年幼不解，她说，“老师教你们不容易，要懂得谢谢人家。”没文化的奶奶是多么地尊重老师，又是多么盼望我成为识文断字的人，长大后不再像



她那样当个“睁眼瞎”。

上初中时，每当我下了晚自习回到家里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。但不管春夏秋冬，小屋子里总留着一盏温暖的灯，香喷喷的饭菜摆在桌上，奶奶总会看着我吃完，才上床休息。我考上中专后，要住校学习，临走之前，奶奶大半夜的还在为我准备东西，怕我把零花钱弄丢，她在我的裤腰上缝了一只小口袋，还一再嘱咐我掏钱时要小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刚迈出家门，奶奶又追上来塞给我两个刚煮的热鸡蛋。看得出，她脸上虽笑容满面，眼神里却充满着担心和忧郁。望着她花白的头发，满是老茧的双手，因为经常熬夜为我缝补衣服而失去光泽的双眼，

我双脚迈不开步，心里头五味杂陈说不出是啥滋味。

18岁我参加工作后，有时工作不顺心，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家。奶奶看懂了我的心思，告诫我，你现在是成年人，又进了公家的门，要改掉浮躁的脾气，待人要谦虚，说话要和气。为此，不懂事的我还经常嫌她啰嗦。那时，我的月工资是30多元，每月仅交给奶奶几块钱作为家用，我却从来没问过是否够用。奶奶并没在意过，依然无怨无悔地为我默默付出。至今想起来，我的心中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自责。

奶奶是个要强的人。80岁时，依然自己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。虽然步履蹒跚，却极少麻烦别人。1967年，她85岁时，听到我的妻子生下她的重孙女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连续用了几天时间，为小娃娃做了几件连脚裤和小布鞋。没想到，仅仅过了两年，四世同堂的她，就离我远去了。

无论奶奶魂归何处，她平凡清淡的一生和善良忠厚的品德都不会湮灭，我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和眷恋也永不忘怀。

■青春岁月

新兵蛋子

□刘喜伍 文/图



1976年12月，我应征入伍来到北京基建工程兵某部。我们在新兵二连，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被分配到一营三连。我们三连因为表现出色，在营、团都很有名气。

当时，我们连队赶上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，施工不分昼夜，人人都有极高的“战斗”精神，个个都是拼命三郎；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经常受到上级的嘉奖。在连队完成纪念堂两侧雕像的钢筋绑扎任务时，连长郝忠安既是指挥员、又是战斗员，负了伤，但轻伤不下火线，带领全连提前完成了任务，立了三等功。

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，我

也出了力，做出了贡献。这是我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事。当年，我们连队驻地在豁口，现在的太平湖上，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天安门，看到那里的夜景，我感到美不胜收、如诗如画。心中油然想起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那首歌。

连队开展学雷锋活动、学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印象最深的是五班的徐继怀，他是浙江人，非常瘦、驼背，但干起活儿来却生龙活虎。虽然他们大都退伍回原籍了，但想起他们在我新兵那段时光对我的帮助关爱，仍难以忘怀。

同时下到班里的四位新兵，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，我是吉林长岭兵；还有来自通辽扎旗的一位蒙古族兵银庄不会讲汉语，交流很困难；来自广东的李启昌很少讲话；邵风和来自黑龙江五大连池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人长得结实，矮胖，但特能干活。经常起早冲洗厕所，还会做豆腐，经常帮厨，后来物尽其用的调到了炊事班。

那时，大家都很单纯的积极要求进步，大小劳动都争先恐后抢着干，想表现好自己，生怕自己干得少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我也和其他新兵一样经常受到表扬，并被连里选为材料员。由于独立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，立了三等功，喜报寄到我的家乡，让爹妈很是自豪。

火车上的大年夜

□宋序彦 文/图



1983年，春节前夕，在西昌袁家山站，左一为本文作者。

1983年1月，我们已在西昌卫星发射场的测控中心工作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为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的发射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。几百个研制单位的上千台测量仪器进行联调、联试，告一段落后，正好春节快到了，领导决定让我们回京休整一段时间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只能买到大年三十晚上从西昌去往北京的车票了。但为了回家过年，大家都毫无怨言。

大年夜，当我们登上乘坐的车厢时，才发现偌大的车厢中，只有我们实验队的五个人，不需要买卧铺了，硬座车厢中的每个长椅都可以睡下一个人。列车员好奇地看着我们，问道，怎么到大年三十才往家里赶？为什么不早几天动身？我们回答，“我们是北京电子部派出的实验队，参与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，由于工作繁忙，直到现在才有时间回家过年。”近三个月的紧张联试工作，总算告一段落，大家的心情放松了，躺在

长椅上，随着车轮撞击铁轨有节奏的声响，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半夜时分，我被人摇醒，睁眼看，原来是列车上的乘务员，他们每人手中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，微笑地望着我们说，“你们为了执行国家的科研任务，大年三十才能回家团圆，辛苦啦，今天是大年夜，按习俗应该吃饺子，我们特意为你们包了饺子，快趁热尝尝。”顿时，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，很受感动，狼吞虎咽地就把这盘热饺子吃完了，全身上下都暖烘烘的。

第二天亮后，火车已经到达丰台车站。我们起来整理所带的物品，准备下车。为了感谢列车员大年夜给予的温暖，大家联合写了一封感谢信，交给了列车长。我们这些归心似箭的人感慨着，祖国真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，处处都有亲人在。虽然从事的工作岗位各不相同，但大家都在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。

回到北京和家人过完春节，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。我感到身体充满了力量，决心要向列车员学习，把本职工作做好。

我所承担的火箭测控系统，是保证发射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因此我一定要精益求精，组装调试好整个测距系统，使它处在最佳的技术状态。

国防科研工作是有艰险的，但这是祖国的需要，也就是我努力的方向。我要在这条道路上，坚定、踏实地走下去，为我国国防科研工作做出我自己的贡献。